

○引进与诠释

伯克辞格理论的解构思想及其对修辞学的意义^{*}

邓志勇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200093)

提 要:伯克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修辞学家,他虽然不是解构主义者,但其不少论著却闪烁着解构的光芒。本文详细论述了伯克四个主要辞格所蕴涵的解构思想,揭示了这些辞格在现实建构中的作用,从而推翻了“客观知识”、“客观、永恒真理”。伯克的解构思想对我国修辞学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它有助于汉语修辞学打破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提升修辞学学科地位、培养人们的批判性意识。

关键词:伯克;辞格理论;解构思想;意义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1)04-0096-5

The Deconstructive Thought in Burke's Theory of Trope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Rhetoric

Deng Zhi-yo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Burke i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American rhetorician of the 20th century. Although strictly speaking he is not a deconstructionist, his deconstructive thought shines through his voluminous works, which manifest themselves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y bring to light the role of the Four Master Trop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d which thereby overthrows the concepts of so-called "objective knowledge," and "objective / permanent truth." The significance of Burke's deconstructive thought is seen in that it might contribute to breaking the bottleneck constraining Chinese rhetoric, elevating rhetoric's status as a formal discipline, and instilling a critical sensitivity in people.

Key words: Burke; theory of tropes; deconstructive thought; significance

1 引言:关于解构

“解构”是随德里达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解构主义学说之后开始流行起来的术语,在当今的哲学、文艺学、语言学等领域已是人人皆知。然而,在德里达创立解构学说之前的二十多年,解构思想就在美国修辞学泰斗伯克的浩瀚论著中有所论述,只不过他没有用“解构”这个术语而已。至于解构主义,卡蒲陀(Caputo)(1997:32)曾这样形象地描述它:

每当解构主义发现一个坚果壳——一个牢靠的原理或简洁有力的公理,一个想法是把它击破,打破它的平静。的确,这是一个解构主义的经验之谈。这就是解构

要做的事,它的意义和使命,如果它有的话,就是这个。

解构主义的核心在于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所坚持的语言符号或文本意义的稳定性和确定论,其方法是用“意义链”概念取代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在逻辑理性、科学、真理被推崇至极的背景下,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想的出现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公平地说,伯克不是解构主义者,但其修辞学论著蕴涵的解构思想却不能被忽视,因为它对修辞学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探讨伯克辞格理论蕴涵的解构思想,并指出它为汉语修辞学打破发展瓶颈、走向兴旺之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的理论范式研究”(0BY084)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美国修辞学泰斗上月尼恩·伯克的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研究(2007)”的阶段性成果。

2 伯克辞格理论的解构思想

伯克以其创立的“戏剧主义”而著称。所谓“戏剧主义”是把语言作为行为(action),而不是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Burke 1966: 54)伯克一生似乎都在摧毁这样的观点,即先前的现实在人的头脑中通过逻辑和语言得到再现。他并不否认“关于自然的赤裸事实”,但他认为,不管这些事实是什么,都不是科学本身;不管事实是什么,赤裸的事实本身并不表示任何意义,只有陈述才有意义。在陈述的过程中,人们选择问题并对它进行阐述,这是真正的修辞过程,是构建意义的劝说过程。(Gross 1990: 3-4)换言之,科学活动离不开修辞;科学知识不是纯客观的,没有客观的、永恒的真理。

为了推翻“客观知识”、“客观/永恒真理”,伯克采取的基本途径是揭示所有语言形式,尤其是那些貌似中立的语言形式背后都隐藏着修辞动机。他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是修辞性的、隐喻性的。这个观点在深受伯克影响的价值修辞学代表人物韦弗(Richard Weaver)(1970)的“语言是说教”的经典断言中得到呼应。伯克解构的切入点是辞格在知识生成中的作用,因为“不管世界是如何建构的,都要看语言是如何建构的。作为符号使用者的人需要透过一种‘符号雾’(fog of symbols)来审视现实世界的每个方面”(Southwell, 1987: 14)。伯克考察了修辞方法中的“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反语”(irony),目的不是考察它们纯粹的辞格用法,而是它们对“真理”的建构作用。(Burke 1945: 503)伯克对“真理”打上引号,旨在引起人们对拒绝任何简单的客观主义的真理代替观。

伯克认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语”其实相当于“视角”(perspective)、“简缩”(reduction)、“代替”(representation)和“辩证”(dialectic)。“隐喻”是一种用其他事物来看某个事物的方法,它把“那个事物的这个特点或这个事物的那个特点揭示出来”(It brings out the thisness of a that, or the thatness of a this),因此,“从B事物的角度来看A事物当然是把B事物当作一个看A事物的视角”(同上,503-504)。伯克在《永恒与变化》中曾对隐喻与视角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认为“视角是一种不协调(incongruity),因为用另一事物来看某一事物要将一个术语从一个领域挪到另一个不同的领域,这个过程就必须涉及不同程度的不协调”(同上,504)。伯克一反人们的习惯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客观现实会因视角变换所造成的相对性而被销毁,恰恰相反,是通过各种不同视角透视的办法人们才能建构起关于人物/事物的现实。比如,当我们对某个物体感到没有把握时,我们用尺子测量它以知大小,提起它以测重量,嗅它、品它以知气味,挤压它以知硬度,等等,从而获得对该事物的较全面的了解。(同上,504)由此推理,对一个事物观察的角度/视角越

多,对其的知识越全面、可靠。理论上,观察事物的视角往往很多,甚至难以计数,而实际上人们对某个事物的认知往往局限于有限的视角,换言之,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真理,只能是相对的,我们只能逼近真理,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真理。因此,如果人们通过隐喻去认知、描写、建构现实,那也只局限于某个视角,结果可想而知:关于该事物的知识是不完全可靠的,由此方法建构的“现实”、“真理”不是完全客观的、颠扑不破的。

更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就不同等级事物可被审视的视角的数量不同而言,我们可以说“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存在等级’(degrees of being)这种存在等级与我们公平地去审视事物的视角数量成正比例”(同上,504)。譬如,植物比矿物有更多的“存在”,动物比植物有更多的“存在”,人比动物有更多的“存在”,因为前者可以从更多的视角去考察。换言之,每一个更高等级的东西允许并需要一个新领域里的、与较低级事物没有关系的术语。既然如此,把自然科学研究那一套做法挪用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显然不是很合适。

“转喻”的基本策略是把某个无身体的、或无形的状态,用有身体的、或有形的东西来表达,比如,用“心”来表示“感情”。根据伯克的观点,所有关于精神状态的术语从词源上都是转喻性的。语言是通过隐喻延伸(metaphorical extension)而获得发展,先是从身体的、有形的、可触摸的领域,通过类比借用到非身体的、无形的、不可触及的领域,后来人们对这个延伸过程渐渐遗忘,不记得那对身体的所指,只记得无形的、不可触摸的东西。最后诗人通过“隐喻式的延伸”,逆向追溯,从无形到有形,又回到原初的有形的、可触及的东西,这个“古典化的过程”(archaizing)伯克称“转喻”。(同上,507)伯克认为,转喻是“诗学现实”的一种手段,而简缩却是“科学现实”手段。为什么呢?人类关系是要用行动去实现的,而实现它的基本媒介是物质环境下的身体姿态和语音语调。比如,诗人在建构诗学现实时,他知道“羞耻”不仅仅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眼睛的转动,脸色的变红、说话声质的变化、肌肉的运动等等,于是,他用这些身体特征去象征“羞耻”,但他归根结底只是进行术语的简缩,这些身体的对应物仅作为行动涉及的表达“成语”,仅是“辞格”或象征物而已。尽管诗人使用古典化手段,他并没有把转喻作为一种实质的简缩;在诗学现实领域,作为行为动机的心理状态,没有被简缩为物质形式的术语。但科学行为主义者会将这种状态(羞耻)沦为身体的对应物,并对之进行度量。可见,诗学行为主义者使用转喻是作为术语的简缩,而科学行为主义者使用转喻是作为“真正的”简缩。(Burke 1950: 506-507)诗学现实的建构与科学现实的建构是不一样的。在社会领域里,仅仅涉及因果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领域涉及的事物比科学领域涉及的事物具有更高等级的“存在”。伯克认为,科学,

就其本质而言,涉及的范围不外乎陈述当某种条件满足时,某些新的情况预计会出现。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等,是关于“运动”(motion),而不是关于行动(action)的学问,若把关于“运动”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类比式地运用于社会人际关系的研究(并冠之于“人类关系的科学”),严格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同上 505-506)任何用自然界的关联性的类比来研究人类关系必将导致一种简缩,即把表示更高或更复杂一级的存在之物的术语论为更低或更简单的存在之物的术语。伯克通过对转喻/简缩的阐释,揭示了科学解释的不可靠性、非永恒真理性,因为科学对人的行为所提供的有效解释其实却是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其解释本身依靠转喻/简缩。

提喻与转喻相似。提喻是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符号代所指,等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个人代替整个人类或整个人类代替个人。在社会、政治等领域,这种替代关系十分普遍,譬如:一个出生于1980-1990年之间的年轻人可代替整个“80后”;一个在某城市建筑工地劳动的外来务工者可代替“农民工”全体;一个党派的当选首领可代替整个党派。有时,替代关系涉及不同的认知域,属于A领域的东西可以替代B领域的东西。比如,在艺术作品中,属于视觉领域的色彩可以代替心理领域中的情感。由于提喻的特征所限,替代物与被替代物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完全等同,所以科学中的“例证”其实并非百分之百可靠。在科学证明中,人们“举例”来论证,这其实就隐含着“一个例子作为‘部分’代替作为‘整体’的整个被论证的事物。科学领域的知识不是完全可靠的,如果把学科领域中的因果分析即作为“运动”那一套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即对人的“行动”的研究,显然获得的知识更是不可靠的。不仅如此,伯克还认为,对关联性的发现(即对事物之间的因果链条的发现)是受来自于神学及政府法令的意念形式所引导的,这种主观的“不纯性”总可在科学家的某些行为中出现,而科学本质上是从这些不纯性中抽象而来的。(Burke 1945: 505)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真理显然不是客观的、永恒的。

反语不是个人用来认知世界的修辞策略,而是其他人的声音与某个人认知世界方法之间的对话性冲突,因此它是共同认知世界的方法。反语始终在提醒人们:戏剧情节在不断展开,最后的行动还有待于书写;人类戏剧没有唯一的作者,每个人都有声音,每个声音都把自己的情节写入生活戏剧之中。(Murray 2002: 111)所以,伯克认为反语是辩证的,辩证与戏剧等同,“哪里有思想在起作用,哪里就有戏剧;哪里行动者在思考中(in ideation)哪里就有辩证”(Burke 1945: 512)。所以,反语体现的是视角的多样性。它们都是对话的声音、人物或者立场,彼此有机地相互影响。(同上 512)伯克指出,“真正的反语是建立在与敌人之间的一种本质联系之上的,因为一个人需要敌人的存在,并对其感激,而不能把自己

看作为存在于敌人身外的一个观察者,他与敌人应该是同体的(being consubstantial)”(Burke 1950: 514)。譬如,“优越”和“谦卑”这对反语。没有“谦卑”,哪来的“优越”?一个人要有优越感,就必须拿别人来作对比,并认为比他强,离开了与其进行比较的一方,他的优越感则无从谈起。但即使某人因为自己比别人强而觉得有理由感到“优越”,他也不能真正感觉“优越”,因为他必须意识到他要用别人作为自己的修饰或陪衬,意识别人的存在决定了自己的存在,这样的话,他只有理由感到“谦卑”。可见“优越”与“谦卑”共存亡,彼此离不开对方,并可相互转化。伯克关于反语的辩证特点的论述,揭示了事物的辩证特点,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谬误等等都是相互依存的。根据伯克的辩证逻辑,具有“不可避免”的特征可以用一个反语式的公式来表示:以A形式出现的事物将会以非A形式还回(what goes forth as A returns as non-A)(同上 517)。伯克以这样的方法揭示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真理不是永恒的,真理与谬误会互相转化,即使人达到了完美也可能变得迂腐(Burke 1966: 3-20)。

伯克对四个主要辞格的阐述揭示了社会动机研究中存在着关键性错误,那就是像物理科学那样对社会科学进行所谓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因为概念分析的术语,如果要避免错误替代(misrepresentation)的话,这个术语就必须建构得符合具有代表性的佚事(representative anecdote)——但是,为了简缩的目的,科学选择的佚事却没有代表性。若科学分析者要用充分有效的术语来讨论更高等级的事物,那些术语就不能受限于仅分析更低等级事物的范围。严格意义上说,把科学的那一套做法用于“人类关系的科学”是不可能的。(Burke 1945: 510-511, 505)伯克尤其对实验室里的实验颇感不满,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实际上都是通过对环境作出选择,把动物环境模拟人的动机环境而获得的,根本不是关于人的真正的事实,人与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Burke 1945: 78)伯克在《动机语法》中的“定义的矛盾”一节中抨击了科学定义和哲学定义貌似中立的做法。他认为,所有定义都是具体的人为了服务特定场合而创造的,所以对现实的完美再现是不可能的。(Hilderbrand 1995: 632-658)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人们在寻求逼真反映现实的词汇时,必须创造对所选择的现实进行描述的词汇,任何对现实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实的偏离”(Burke 1945: 59)。他提醒人们,即使是最“科学的”命题也是具体人物与特定场景之间的协商(transactions),为了使大多数的探究适合具体场合,探究者必须关注非理性的方面,如情感、美学等,因此科学语言浸透了伦理价值。事实上,人的语言本质不是中立的,人们的话不可能悬置价值判断。伯克指出,修辞学在现代的衰落与现代主义对科学理性的崇拜有关,并认定对应用科学的崇拜

(a cult of applied science) 引起了一种希特勒式屠杀的“科学”(the Hitlerite 'science' of genocide) 以及核武器竞赛。为了重新审视修辞学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他(1966: 3-20) 把对人的行为及关系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人性论哲学观之上:人是使用和滥用符号的动物、否定的发明者;由于他制造的工具与他的自然环境相隔离;受等级精神的驱使;由于致善而变得迂腐。

伯克提醒我们,语言现实既没有牢固坚实的基础,也没有本质。由象征符号构成的景象与其说是字面上真理构成的领域,或由定义清晰的术语与有棱有角的事物一一对应的领域,不如说是一个没有实质领域的隐喻,一个伯克所说的“类比延伸”。类比对隐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抽象概念都只是一个特定事实与属于同类事物的事实之间的类比标记,至多它标记了比一般隐喻更加接近的类比”(Wess 1966: 71)。这些辞格的特点及运作所揭示的事物之间不稳定的关系,显然具有解构主义功能:它打破了本质特征与偶然特征之间的经典对立,表明没有任何分类是基础的,分类都是根据特定情景中的兴趣为参照而建构起来的。分类都伴有简化和类比两个过程,其核心是隐喻。

伯克对这四个辞格的理解来源于他的语言符号观。他认为,语言符号,因为它是符号,所以是辩证的。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人用它来谈论某事物的时候,必须用不是它的事物来指涉它,比如说树这种植物,必须用非植物的符号“树”来指涉它;二是定义某事物的时候,必须用不是它的事物来定义它,否则就陷入了循环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辩证的,也是隐喻的。语言的隐喻性是认知的需要,因为语言的“隐喻比逻辑更有效。隐喻是生产性的,它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没有看到的。隐喻是开放的、启发的、引发的。逻辑是决定的: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已经看到的”(刘大为 2001: 67)。语言虽然由有限的符号构成,但人却可用它来谈论任何事物,展示无限的大千世界,这体现了人的普遍需要和遵守的语言经济原则。

伯克将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语视为“四个主要辞格”,是因为人的思维及语言交流都要依赖于它们。他用辞格理论作为一种语言学解构工具,推翻了知识的客观性、可靠性以及真理的客观性、永恒性。

3 伯克解构思想的积极意义

伯克辞格理论的解构思想对我国修辞学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它对我国汉语修辞学打破辞格瓶颈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汉语修辞学自陈望道先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修辞学发凡》的问世以来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不可否认,当前它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主流汉语修辞学仍然把修辞学定位于语言表达技巧尤其是辞格的研究。“辞格从来就是修辞学的一种中心课题”(何

伟棠 2000: 11),“有的修辞书更是全部以辞格为纲”(宗廷虎 1997: 388)。修辞学则成为一门“效果之学”,由此也把自身放逐于语言本体研究之外。……这已经成为今天限制修辞学发展的一大瓶颈。(李秀明 缪俊 2006: 29)

要突破这种瓶颈,几个彼此相关的重要问题需要学者们再思考。当前汉语修辞学主要把辞格当做语言表达技巧、一种锦上添花的点缀来研究,而不是把它作为修辞学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当然不可否认,受国外认知语言学的影响,国内刮起了的隐喻研究的强风,但这种隐喻研究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的,而不是从修辞学角度切入的。)反观伯克的辞格理论,我们会发现它把辞格作为修辞学的认知性的具体实现形式来研究。相比起来,汉语修辞学对辞格的研究,在哲学意义上要逊于伯克的辞格研究。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直接启示:汉语修辞学要加强从真正修辞学的角度来研究辞格,也即从劝说、从诱发合作的角度来考察辞格的作用。最近美国修辞学界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动态——“隐喻修辞批评”——值得国内修辞学者关注。这种修辞批评范式就是分析隐喻在实现语篇的劝说功能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基本假定是:隐喻具有劝说功能。

然而,对辞格进行修辞说服力研究,还要取决如何看待修辞。那种把修辞看作是充满美感的词语技巧的使用,把修辞学看作关于语言表达效果的学问的观点,无外乎相当于将修辞比作“糖”,其功能是给需要表达的内容添加好的色彩和味道,使内容更容易被人“吞下去”。这种观点归根结底是把修辞学当作一种“哲学的补充”,其中隐含着语言工具论以及修辞与语言、内容、形式相脱离的假定,这与修辞学泰斗伯克(1945: 41-43)将修辞根基于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上的观点相去甚远。伯克关于四个主要辞格的理论提醒人们:要充分认识修辞的认知功能(即修辞在知识生成中的作用)以及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修辞根基于语言基本功能之上,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著名修辞学家琼斯通(Henry W. Jonestone)曾指出,“倘若人要想避免修辞,那么就离开他的社团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生活……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能摆脱修辞,因为在促使自己干某事或接受某个结论的过程中也是有修辞的。劝说自己与劝说他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谁放弃了修辞谁就放弃了他的人性……做人就必须实施修辞”(Burks 1978: 57-59)。

伯克的辞格理论的另一个意义是使人们对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从而提升修辞学的学科地位。传统上,汉语修辞学由于注重文辞的审美情趣,自然与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关系密切,而与实用性语体的关系较为疏远,对科技语体、法律语体等“文学度”(degree of literariness)度低的语体关注甚少,似乎这些“客观性”很强的语体不需要修辞。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是对修辞在知识生成中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科学

哲学家库恩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知识是通过科学界的论辩而不是通过新的发现而获得发展的。……语言并非进行信息交流的清澈透明的媒介,而是模糊的、具有反弹性的,充满了文化偏见,即使在相当开明的科学领域,也是如此”(祁寿华 1999: 48)。换言之,即使科学知识也来源于修辞论辩。认识到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毫无疑问有助于修辞学的学科交叉与交流,丰富学科的内涵,推动学科的发展。

伯克辞格理论蕴涵的解构思想的第三个重要意义是促使人们对事物,对“知识”、“真理”、“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因为人是符号/象征的动物,且语言与修辞不能分开,人在语言的家园中成长,必定会形成与其背景相配的“词屏”(terministic screen),制约他的认知。伯克(1966: 50)精辟地指出:

我们必须使用词屏,因为我们不用术语就无法谈任何事情;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术语,这些术语必定形成一个相应的屏,任何这样的屏都将把人的注意引向某个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可能还有不同的屏,每个屏都各有引导注意的方法,决定观察的范围,因为这个范围蕴含在特定的词汇之中。

语言的材料是词汇,而词汇最直接、最明显地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情感色彩。即便是我们所熟知的语法结构、语篇模式等,也同样体现了人类的精神文化。关于修辞的制约性,我国著名修辞学者谭学纯、朱玲(2001: 59-63)也有精辟的论述:

……作为修辞的动物,人创造了修辞,又被修辞所缠绕。修辞洞开我们的思维空间,也堵塞了我们的感觉。修辞聚集我们的经验,也扩张我们的经验。修辞规定我们思考的方向,也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向。

照此推理,人们在用语言、用修辞去获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把主观意志带入其中,所谓的“知识”、“真理”、“现实”不过是修辞的产物,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中性的。修辞不仅具有认知性,也有制约性。因此,人们就要对它们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觉,谨防它们可能导致的某种“霸权”。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精神之体现。

4 结束语

伯克把隐喻、转喻、提喻、反语看作“主要辞格”,说明视角是获取意义、正常认知世界的方式,任何一个视角所看到的意义都可能只是整个意义的某一方面。(唐青叶 2009: 62)伯克的辞格理论以及他的语言隐喻观是他解构思想的重要内容。他的解构思想使人们联想起他(1966: 3-20)对人的宣称“人因为完美而迂腐”,它提醒人们必须关注现代性带来的所谓“人类解放”、“科学技术的进

步”,告诫人们在欣赏自己成就的同时,别忘了审视它给社会带来的负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参考文献

- 何伟棠. 王希杰修辞学论集[C].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李秀明 缪俊. ‘修辞学的转向’——在复旦大学首届修辞学沙龙综述[J]. 修辞学, 2006(1).
- 谭学纯 朱玲. 广义修辞学[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 唐青叶. 视角与意义的建构[J]. 外语学刊, 2009(3).
- 王寅. 寓意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刘大为. 比喻、近喻与自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 祁寿华. 西方写作理论. 教学与实践[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申小龙. 中国句型文化[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 宗廷虎. 中国现代修辞学史[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Burke, K.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Burke, K. *A Grammar of Motives* [M].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45.
- Burke, K. *A Rhetoric of Motive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0.
- Burks, D. M. *Rhetoric,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n Exploration* [M].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Gross, A. G.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Hilderbrand, D. L. Was Kenneth Burke a Pragmatist? [J].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1995(3).
- Johannesen, R. L. et. al. (ed). *Language is Sermonic: Richard M. Weaver on the Nature of Rhetoric*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urray, J. W. *Kenneth Burke: A Dialogue of Motives* [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2.
- Southwell, S. B. *Kenneth Burke and Martin Heidegger* [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 Wess, R. *Kenneth Burke: Rhetoric, Subjectivity, Postmodernism*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